

长篇纪实

暴行纪实

『七三一』

来自魔窟废墟的最新报告



細菌部隊の中心人物石井四郎（当時）

谨以此书献给：

惨死在日军 731 部队细菌实验中数以千计的中外仁人志士！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序

欣闻佟振宇、陈春山合作的长篇纪实《来自魔窟的最新报告》一书即将由出版社付梓，做为一名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压迫的老作家，对他们付出艰辛劳动而获得的这一可喜成果，我表示由衷地敬意和祝贺！

我与佟振宇认识多年了。他在《新工人日报》当记者时，就在《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了许多通讯、小说，是一位写作勤奋、作品颇丰的作家。1982年“9·18”事变纪念日前夕，中国作协委托黑龙江作协分会接待日本著名进步作家森村诚一。森村先生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他的长篇纪实《恶魔的饱食》，在日本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翔实地披露了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利用活人研制细菌、进行细菌战的暴行。他这次专程来哈市，是为了进一步考察731部队在平房的遗址，以完成《恶魔的饱食》的续集。森村先生到哈市后，请我们作协帮助找一些了解731罪行的老人开个座谈会。佟振宇同志以哈尔滨地方志研究协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座谈。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佟振宇在研究和收集731部队罪行这方面很有名气。他为了追踪731部队罪恶史，曾跑了全国数家大图书馆，调查了数百名知情人。他先后在《哈尔滨史志》、《黑龙江文史资料汇编》上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这方面调查报告。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向森村先生提供了大量最新调查结果，使森村先生非常感激。当《恶魔的饱食》续集出版后，森村先生特意从日本寄来有他签字的该书，以示他对佟振宇的谢意。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佟振宇等人陪森村先生考察平房731部队遗址的照片。

森村先生的来访和他续集的出版，对佟振宇触动很大。一天，他对我说：“731细菌部队是在我们中国用细菌杀人，而且就在哈尔滨。可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揭露731暴行的书出版，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我想以我们受害的中国人这个角度，写一本控诉731部队暴行的长篇……”从此，他放弃了许多工作，非常执着地，以极大的热忱开始潜心整理这方面的材料。10余年来间，他光做笔记近二百万字，收集了30多斤的文字的图片资料。然而，正当他信心百倍地着手写作时，因劳累过度，他的双眼骤然失明。他悲痛欲绝，夜不能寐。一天，他猛然想起青年作家陈春山来。陈春山在创作那部颇有影响的长篇纪实《青楼恨歌》时，曾找过佟振宇了解旧社会“荟芳里”的情况，两人有过愉快的交往。佟振宇心想，何不问问他是否愿意合作，共同来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托人写信找到陈春山，两人一拍即合，陈春山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为了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能出版此书，将已创作了一半的另一部长篇暂且搁至一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著工作。

抚摸着沉甸甸地书稿，看着这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我感慨万千。虽然，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灭绝人性地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已成为历史，中日两国已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只有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忘记这段中国人受屈辱的历史，才能清楚今天这一切是来之不易，人们才能珍惜今天，以热忱和充实的态度对待生活。我想这部长篇纪实的意义正是在于此。

不久前，佟振宇的双目经过手术已有好转，又能写东西了。仲秋的一天，他拄着拐杖找到我的家，约我为他们的著作写几句话。盛情加友情，我固辞不果，不揣鄙陋，即兴写了以上的话，权且算作这本书的序吧。

关沫南

1992年仲秋写于寒舍

目录：

引子：	“王道乐土”——恶魔的产床	(1)
第一章	石井四郎——撒旦的化身	(8)
第二章	背荫河村——初露狰狞的地方	(15)
第三章	1933年至1936年——恶魔的踪迹	(21)
第四章	平房——中国的“奥斯维辛”	(24)
第五章	八大部——恶魔的“五脏六腑”	(38)
第六章	四支队——魔爪伸向四面八方	(48)
第七章	特别军事区域——森严壁垒的国中之国	(57)
第八章	特殊输送——恶魔的饱食	(63)
第九章	地下监狱——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之门	(74)
第十章	试验的黑幕——恶魔的游戏	(80)
第十一章	第100部队——恶魔的孪生兄弟	(92)
第十二章	三次华中细菌战——恶魔小试“牛刀”	(102)
第十三章	细菌武器——恶魔的“天才杰作”	(111)
第十四章	解剖活人——野性的证明	(127)
第十五章	不屈的头颅——一次流产的暴动	(132)
第十六章	劳工——任意驱使的奴隶	(135)
第十七章	销尸灭迹——残暴的肆虐昭然于天下	(143)
第十八章	寿终正寝——历史的遗憾	(148)
尾声		(154)
后记		(155)

引子：“王道乐土”

——恶魔的产床

第二次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昭和6年）的“9·18事变”，止于1945年9月2日（日本昭和20年）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投降书的签订。在这长达近14年的持久战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尽其所能，丧尽天良，干出了人类永远不能饶恕的罪恶。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就是侵略。

日本自明治以来，国力逐渐强盛，随之而不断强大的是德国式的军阀政治，这种政治很快渗透到日本国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队系统。当时，军部和一部份官僚在山县有朋元帅^①的领导下，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了独立的一大军阀势力。后来这股势力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终将支配了日本的国运，挑起了中日战争的爆发。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贫乏的岛国。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的激增，激发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贫乏的资源与狭窄的国内市场时时困扰着他们。为此，资本主义世界的日本，依其侵略扩张的本性，欲想强盛，就必须向海外掠夺资源和争取市场。发展大东亚政策乃其唯一可行之基本国策。

明治初年，日本国内就实行侵华三步骤：先侵台湾，次侵朝鲜，再吞并中国全土。所谓：“征韩论”，就是依此步骤而提出的，它主张在沙皇俄国和欧美列强入侵朝鲜之前先抢占朝鲜，以此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的跳板。日本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在1881年写了一篇《邻邦兵备记》，在论中国的兵备中，就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九年之后，已当上首相的山

县有朋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更放肆地胡说什么：“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一是防卫利益线。”^②所谓主权线，即：“国家之疆域是也。”^③所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完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④这显然把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领土划入日本“利益线”的范围之内。到了1895年，还是这个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了一份“兵制改革”的奏文，他叫嚷：日本要扩充军备，加紧侵略“新领地”，把“利益线”也就是“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进而成为“东洋的盟主”。^⑤

始于此，日本政府逐渐产生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基本国策，此即所谓：“大陆政策”。

在“大陆政策”产生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付诸行动。1874年日本军阀侵犯了我国的台湾省，翌年又派兵侵略了朝鲜的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而建立了侵略、夺取中国东北的跳板。1894年7月，日本又以朝鲜“东学党事件”为借口，对清政府不宣而战，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此战，日本的作战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不仅限于从朝鲜击退清军，而以出征清朝帝都北京为目标。战争以清政府败绩、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虽然日本的贪婪遭到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但它终究掠夺了将中国台湾省和澎

国变为变成其殖民地和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为代价。从此,奠定了以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基础。

1904年,日本借口为:“保证清、韩两国领土之完整,”在英国支持下,不宣而战,发动了日俄战争。战争以俄国失败,日本胜利,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而告终。该条约使日本最终获取了对朝鲜的直接统治权和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从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将南满洲划入日本势力范围中。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等欧洲列强不得不将它们在亚洲的军队撤回;沙俄也被迫倾注全力去对付欧洲战场;美国也因急于参加欧战而放松了在太平洋上的军事部署。这样,就给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独吞中国的良机。日本军国主义元老井上馨叫嚷: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天赐良机”,他们认为此乃“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之大好机会。于是,他们首先把对德国的战争“视为推行国策的手段”的第一步。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被德占领的中国山东胶州湾、青岛和胶济铁路。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大的武力支持下,进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的提出,充分的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的一切都掌握在它的魔掌中,以便独霸中国,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大陆政策”的狂妄野心,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十一条”虽然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在英、俄、美等国的限制下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一形式,日本帝国主义终究掠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同时,还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期限均延长为99年,为其进一步控制满洲铺平了道路。

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把富有侵略野心的田中义一大将捧上台组阁。田中义一一是日本军阀主要头目之一。他是长州藩士出身。日俄战争时任陆军参谋。战后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军务局长和参谋次长。

1918——1921年和1923——1924年两次任陆相,是继山县有朋之后的陆军长州阀巨头。1925年退役后出任政友会总裁。他组阁兼任外相时正值中国蒋介石北伐,为了确定对华政策,1927年6月至7月,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田中外相在会上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此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潘仰尧:《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

“田中奏折”并不是田中义一个人的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将其“前辈”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思想系统化而已。奏折中的:“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早在日韩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德战争中就已实施。但田中奏折却成为此后日本帝国主义18年侵略战争的行动指南。

同年8月,又召开了“大连会议”。“大连会议”是“东方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由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主持。会上进一步协商了所谓“满洲问题”,研究了具体贯彻“东方会议”的方针,策划扩大“满铁”权限、“修建铁路”、“经济开发”和“治安协定”等问题。(李君:《国难痛史》、《东方杂志》24卷17号;《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但是,无论是“东方会议”,还是“大连会议”,都详细研究了加强控制张作霖的问题。

二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土匪出身,辛亥革命时,他率兵镇压了奉天的革命运动,当上了陆军第27师师长,掌握了奉天省的主要兵权。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19年他“统一东北”,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随着张作霖的羽毛渐丰,其野心也逐渐大了起来,1924年他打败了直系军阀后,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翌年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常诚:《张作霖》)

张作霖入关欲图逐鹿中原的企图,大大违背了其日本主子的愿望,因为当时:“田中大将

认为,中国本土可以由国民党去统一,但满洲这个特殊地区必须置于张作霖的势力之下,使之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这是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田中政策”的关键。因而,对张作霖入关称大元帅十分不满。但是,张作霖一意孤行,不仅极想维持其大元帅之职,而且还萌发不脱日本主人和不把关东军放在眼里的思想,甚至开始积极同美国勾搭、同英国拉关系。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张作霖、设置新的代理人,以维持其在满洲的既得权益已实属必然。终于使关东军执行田中内阁政策:“甩掉张作霖,建立一个脱离南京政府的以张学良为首的新国家”。(苏:《东京审判》第15页)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半,在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东北王张作霖一命呜呼。

皇姑屯事件,点燃了“满洲事变”的导火线。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以张学良取代张作霖,以在中国东北建立其永久的“利益线”。但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是个爱国思想浓厚的军人。他完全是在英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当时的顾问就是英国人端纳。对于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不仅感觉到这是日本人的阴谋,而且还发誓与日本人不共戴天。因而他当上东北王以后所实施的政策,完全异于他的老子,实行排日计划。他亲手枪杀亲日派杨宇霆(1929年1月10日);他悬挂青天白日旗,对国民政府表示忠诚(1928年12月29日)(《东方杂志》25卷、26卷《大事记》);他不顾关于满蒙五铁路的约定,积极着手建设与满铁平行路线,采取包围满铁的策略;他设置法令阻止“二十一条”中规定的日本人在南满居住往来的权利及商租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5页)等等、等等。

张学良的态度,使日本人绝望,其排日措施严重危及日本人的“利益线”,危及“田中政策”的实施。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和平入侵不成,诉诸武力”的政策来解决满洲问题了。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开始突然袭击驻有中国军队的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实现田中步骤第一步的开始,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早在1929年,关东军就按照“东方会议”的方针,以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即组织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阴谋策划、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以及侵占后的统治方案。1931年6月19日,参谋本部《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85页)脱稿,大纲阐述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主题。大纲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作了频繁的军事调动和部署。1931年4月,日本军部将多门中将率领的第二师团调往中国东北换防。多门师团的士兵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出生的,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同年7月,关东军把两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秘密运往沈阳“独立守备队”的兵营内,“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东京裁判》上卷,第323页)。为了实现“以寡制众”的目的,特务头子土肥原一面挑唆山西军阀阎锡山,令其出兵华北,牵制东北军,以使张学良分散兵力;另一面唆使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军事联合行动。此外,还策划在延边、哈尔滨掀起暴动,并“鼓动蒙古独立”,《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423页,第385--386页)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1931年8月3日——4日,关东军举行了军司令官、师团长的临时集会。会上,就满蒙问题陈述如下:“满蒙在国防上、政治上、经济上对帝国生存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但最近该方面情势有使帝国甚为不满之倾向,且有日趋严重之感……当此时机,凡属军职人员,应当更加竭诚奉公,热心教育训练,克尽职责,勿稍疏虞,是所至盼。”(《日本军

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87页——188页)箭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仅不积极组织抗战,反而严厉压制要求抗战的东北军。本来,战争伊始,张学良东北军有20万余,而日军仅有1万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86页)虽然日军装备精良,但战争胜负仍难卜定。可是蒋介石一再电令东北军:“……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东北档案馆日侵998》)命令东北军“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还胡说:“日本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样,东北军有枪难鸣,坐以待毙。

9月19日,沈阳、长春失陷;21日,吉林失陷;11月19日,齐齐哈尔宣告陷落;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自1931年9月18日柳条沟事件始,至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止,仅四个多月的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1932年7月1日,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计划最终实现。

侵占满洲只不过是“田中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不是其最终目的。

1933年2月23日,日军开始对热河作战,至3月4日,基本占领热河。日军踏入关内。同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表面上看,停战协定的签订是结束了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但这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缓兵之计,因为日军不仅越过了长城线,而且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许多据点,为其进而策划华北五省独立和唆使蒙古独立奠定了基础。

1935年7月6日,日军又以武力迫使《梅津·何应钦协定》的签订,将“站在反日反满活动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军队、机关”逐出了河北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5页)为了进一步使华北脱离南京的羁绊,由

中国方面人士成立自治政府,导致日、满、华北的彻底亲善,造成第二个满洲局面。1935年9月24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需要指导结成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多田声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7页)并与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与万福麟,以及从察哈尔南下到河北的宋哲元等,暗中商谈华北自治。同时,在军事实力上,华北方面的日军也不断得到增强。1935年11月12日,关东军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派步兵一个联队,轻坦克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工兵一个中队于15日前开赴山海关集结待命。终于于这年11月2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翌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大汉奸王揖唐任委员长。

日关东军在策划华北自治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西部内蒙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西部内蒙古民族投靠日满,变成日本的附属地。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订了“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为:“关东军为对苏作战,以及便于准备各项必要工作,并且为便于巩固满洲国之国防与统治,首先设法扩大与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地区。随同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独立。”(《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4页)

翌年1月,关东军又制订了“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施策重点:“首先整顿、巩固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入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5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与支持下,1936年1月,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公开投降日本,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并于同年5月成立为伪蒙古军政府。

至此,日满势力已深深渗透到华北和内蒙,公开军事占领已是个时间问题了。

为了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早在1935年始,日本就已着手制订对华全面作战计划了。对华北,他们计划以:“第7军占领北平及天津附

近要地”、“第8军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对华中,计划:“第9军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并根据情况与华北方面南下之部队会战汉口。”对华南,则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占领福州、厦门及广东汕头等地。1936年4月18日,日军将中国驻屯军(华北)增加了大约一倍,驻北平、丰台、天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5页)。

同年8月7日,日本四相(首相、外相、海相、陆相)会议决案《帝国的外交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对华措施的重点应当是‘迅速将华北变为反共亲日地区,把整个中国变成反苏亲日的国家’”。(苏《东京审判》第279页)4天后,五相(四相加上藏相)会议决案《基本国策》决定:“每个时期的基本目的均是以武力在亚洲大陆建立牢固的基地,并以武力建立对东亚的控制权。”(苏《东京审判》第33页)决意全面侵华已显然。

1936年后半年,1937年前半年,中国形势日趋好转,全国上下抗日意志日益谐调。1936年,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工作比较顺利,9月西山派归顺,南方稳定。于是,蒋介石开始了华北的统一工作,仅11月“绥远事件”蒋介石命20余万中央军和非嫡系军北上支持绥远军、并亲赴洛阳指挥,足可见其统一华北决心之坚定。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共产党调停下得到和解,始于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国国内的抗日形势使日本帝国主义慌了神,为了抢在蒋介石之前占领华北,才先发制人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于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按既定计划,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

“七·七”卢沟桥事变意味着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

三

“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

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里唾手而得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时骄横气焰不断上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在向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竟公然叫嚷:“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41页)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也狂妄吹嘘道:“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有增无减。当日军还在与中国军队炮战宛平城时,就曾夸口说3个小时即可占领宛平城。在宛平驻军29军吉星文团将士的奋起抵抗下,入侵的日军遭受挫折,不仅3小时没拿下宛平城,就是一天两夜也毫无进展。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华北战场上的兵力由7个师团增加到12个师团,此时日军又吹嘘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而实际上,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3个月内不仅没有灭亡中国,就连华北也没有真正完全侵占。1938年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议《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声称:“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致于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451页)而在战场上,日军仅就武汉会战即感到许多困惑。不仅达不到战争目的,而且日感陷入战争泥潭,愈陷愈深。

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因而日军在东三省如入无人之境,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侵占了辽、吉、黑三省。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迥异的变化。此时不仅中国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愈益高涨,而且国民党与共产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而日本帝国主义所梦想的东三省速战速决“战果”已不复出现。不仅如此,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初期节节进逼,侵吞了中国广大山河,但由于日、中两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现状以及国际道义等方面的迥异,因而日军不仅不能再获东三省之“战果”,而且随

着持久战的发展以及世界战争的爆发,战争主动权已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困境已日见严重。

兵力不足、兵源枯竭时常困扰着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伊始,日本即倾巢出动,妄图一举侵吞全中国。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的梦幻遭到破灭。随着战争的推移,日军在中国的战线不断拉长、战场不断扩大,而兵力却日益不支。1938年11月,武汉、广州会战结束时,日本驻军在中国和朝鲜即已配置了33个师团,而其国内却仅剩近卫师团了。到1939年初,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仍达184个师,而日军陆军兵力只有以24个师团、45个飞行中队为基干的部队。(《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475页)日军已完全丧失继续采取攻势的能力。这样,对华作战之日军未能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进攻的极限,而以此态势进入长期持久战,在战略上日军已陷入困境。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判定日军攻势力量已成强弩之末,今后将开始对日正式作战,因而决心转守势为攻势,以期消耗日军战力,扭转战局。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不仅要全力对付中国军队的反攻,而且还要应付来自海、陆、空的英、美的攻击,对于一个人口缺乏、国土狭窄、资源奇缺的岛国日本来说,其兵力的分布已漏洞百出、首尾难顾。

资源奇缺,特别是军用物资的缺乏也时常困扰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是个面积不大、资源缺乏的岛国,特别是石油及五金矿藏之类的资源在日本历来靠进口。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的非正义性,因而遍遭世界的谴责。特别是世界反轴心国阵营形成后,日本军用物资的进口已基本断绝。1941年7月25日,美国对日本实施冻结令,冻结日本商社在美国的资金,停止对日本的全部贸易。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样,日本几乎散失了除占领区外的所有市场和进口军用物资的一切途径。军用物资的奇缺,使日军日感力不从心,陷入战争困境。早在上海作战时,日军就因缺乏弹药而陷入苦境,当时日军的“野炮、山炮等的炮弹不足,机关枪、

手榴弹也缺乏”,“此外,对每5中队配备4门15榴及12榴的炮弹每天也限制在30发左右。”1938年,在与苏联的“张鼓峰事件”中,如果由此爆发苏日战争的话,日军“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372页)特别是在美、英、荷三国冻结令之后,日本的军用物资更加奇缺,国力更加不支,正如首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国际法庭受审时的书面证言说的那样:“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实力在一天比一天地弱下去。例如,再过两年,我们的海军就要动弹不了了。”(苏《东京审判》,第371页)

世界战争,使日军首尾难顾,陷入困境。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就是侵略,其侵略的目的是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图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因而势必以世界人民为敌,故同样也会遭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反对。自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放第一枪始,就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建立革命队伍,奔赴抗日前线。1935年夏,东北抗日联军组成。这支军队初建时有7个军,后来发展到11个军,人数最多时达4万5千人。他们分布于东北各地,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七·七”事变以后,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却日益旺盛,这不仅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而且牵制了大量日军,有效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据资料表明:1940年仅驻华北、华中、华南之日军就达72万8千,航空部队20个中队,1941年度维持72万8千,1942年度为68万,1943年仍为68万,1944年为60万(以上各年度均不包括在东北和台湾驻日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607—608页)而据日本厚生省援护局资料调查,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4日,日本在大陆的死亡人数陆军为385200人、海军为19400人,共计404600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

为了称霸世界,因而在他的敌对目标中不仅有中国,而且还有苏联、美国等国家。在日本每年度的军事会议中,苏联被列为“日本最危险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始终在中苏边境置有重兵,并肆意挑起事端。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1939年5月的“坎诺门冲突”以及1941年6月的“关特演”,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苏实力的试探和准备进攻苏联而挑起的事端。同样,美国也是日本的敌对目标,因为美国不仅支援中国抗战,而且阻碍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实施。为了顺利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计划,解除美国的干扰,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轰炸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以世界人民为敌,因而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苏、美、英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共同反轴心国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日益变为劣势,陷入困境。

四

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就是发动战争、进行

侵略,以图建立其世界霸权。自明治时,日本军阀政治产生始,在日本就开始产生和形成以进行侵略战争为职业的军国主义集团,他们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行动指南。为此,他们肆意挑起了“9·18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并借此侵吞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片领土。但是,尽管日本军国主义狂妄之极,终因其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其国力不支,产生兵源枯竭、兵力不足以及战争资源奇缺等不利因素。因此,自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陷入了严重的战争困境。

为了能顺利实现田中三步骤,达到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目的,也为了应付战争、负隅顽抗,自战争一爆发时,日本帝国主义就不仅祈求神灵的保佑,而且绞尽脑汁寻求某种新式的,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的产生。细菌武器的研究、制造和局部地不断进行实战实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注 释】

①山县有朋——1838—1922年,日本山口县西北部人,在明治初年,两次组阁。在陆军中,历任要职。甲午战争中,任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团长官(司令)。1904年后,由大将升为元帅。一生仇视政党和政治。

②③④——见三联书店出版的《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第34页

⑤——见日本伊藤博文:《秘书类纂·兵政关系资料》第145—146页。

第一章 石井四郎

——撒旦的化身

为了早日实现称霸世界的“田中计划”，也为了摆脱战争困境，日本军部对已有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已不甚满足。他们渴想有一种新的、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可怕得使敌人在实际上无从设法抵抗”的武器的诞生。石井四郎由此应运而生。

一

日本政府在东京设有个“东京科学研究所”，局长叫伊藤工学，是个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早在1931年，日本军部就向东京科学研究所发出军令，令其在短期内，迅速完成研究和制造一种或多种足以达到军部所期望的秘密杀人武器，并派了一批军人特务监督和保护科学研究所工作。（草原：《日寇细菌战暴行》第一页）

东京科学研究所局在伊藤工学局长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研究某种秘密杀人武器的工作。然而愿望毕竟是愿望，虽说许多科学研究成果是在热情和勤奋中产生的，但总还要有个过程。东京科学研究所局在毫无目标的研究中更过了一年。显然，这种研究毫无进展。这样，就使急于获得某种秘密杀人武器，以企图早日称霸世界的军部大为恼火，骂他们统统是“饭桶”，“不中用”的家伙。

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但东京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依然没有头绪。于是，军部一怒之下，下令东京宪兵队本部：“立即拘捕伊藤工学局长。”拘捕他的理由是：“工作不力”和“浪费国家的开支”。随之，对40多名科学家斥责为：“消极怠工，不服从军令”，将他们全部撤离岗位，去做低级的工役，并且降低了他们的薪水待遇。（《日寇细菌战暴行》）

日本军部处罚了伊藤工学及一批科学家后，并没有放弃研制秘密杀人武器的念头。为了尽早研制出这样一种秘密杀人武器，军部立即号召部下推荐科学人才。于是陆军省军务署长永田铁山少将、军医署军医课长梶塚隆二、陆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长铃木等人，先后都向军部推荐“军医石井大尉是个难得的人才。”

军部也风闻石井四郎军医大尉，是东京陆军军医学院的讲师、细菌学家，在学院主讲细菌学、防疫学等。他曾于1928年至1930年间出访欧洲各国。回国后他就到处鼓吹说“（欧洲）各强大国家都在进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会遭到严重困难。”“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而且“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它种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①因而“日本应该准备细菌战。”

于是，日本军部立即批准由石井四郎来承担研制秘密杀人武器的任务。并下令晋升石井四郎为军医少佐、主任，且在东京陆军军医学院里拨出实验室、派5名军医给石井四郎当助手，组建“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所”。这即“731”最初的雏形和双重名称。为了使石井四郎尽早拿出秘密杀人武器，军部还下军令给陆军省：“要在物质和名誉上去满足他。”当时正是

1932年8月。

从军部对石井就职后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处理上,就能看出军部迫切需求秘密杀人武器的心情。

在日本东京城内,有条妓院聚集的乐坂亭街。这条街上,灯红酒绿,器闹异常,三教九流,人群混杂,是日本宪兵队搜捕国外间谍和思想不轨之人的重要场所。一次,东京宪兵队发现一个挥霍无度、专门寻欢于妓院的少女的军官,于是,便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很快便发现他就是防疫研究所的军医主任石井四郎少佐。同时,宪兵队还调查到,石井四郎用于嫖妓的钱高达5万日元,且全是公款,是与帝国医疗株式会社医疗器械制造公司相勾结而盗用出来的。于是,东京宪兵队立即拘捕了石井四郎。没料到,正当宪兵队要对石井四郎进行审讯时,突然接到宪兵本部下达的命令:“立即释放三等军医主任石井四郎。”此时,就连石井四郎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方得知,原来是陆军省军务署署长永田铁山保了他。永田铁山向军部打报告说:“石井军医主任,毕竟是个有用的人才,用绳子捆起来太可惜了。”军部因为急需秘密杀人武器,很需要石井四郎,所以同意了永田铁山的申请,责令宪兵队释放了石井四郎。军部迫切需求秘密杀人武器之心情,从此可见一斑。

1935年8月26日,永田铁山在日本军界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台湾步兵第一联队附、陆军步兵中佐相泽三郎刺死。石井四郎为此特铸永田半身铜像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示对救命恩人的怀念。²

二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个大地主之家。父亲是加茂部族有名望的地主,全家住于豪华的



石井家族的部分成员。后排左起:石井四郎、石井虎男、石井刚男、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石井四郎。

葱绿公园中。石井四郎兄弟姊妹共五人,老大石井虎男,老二石井刚男,老三石井三男,石井四郎排行第四,最小的是妹妹,后嫁给中村英二为妻(中村英二后为石井推荐,在长春传染病院,参加细菌实验工作。)

石井四郎自幼头脑灵敏,在家乡池田小学读书,那时他便显示出非凡的天资。他能够在一夜之间把白天所学的全部课程毫无遗漏地背诵出来。小学毕业后,他先考进千叶中学,后考进石川县金泽市第四高级中学。1915年,“作为陆军的委托学生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6页)1920年大学毕业后到陆军服兵役。最初,在日本近卫步兵第六联队当见习军医,后晋升为军医中尉,不久又调到东京第一军医院任军医。1922年,石井结识了后来一直与他共事,对他实现细菌武器研究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梶塚隆二。1924年2月,石井重返京都帝国大学深造,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1926年3月出校,仍回东京第一军医院,任传染病学讲师,升军医大尉。1928年至1930年间,经军部派遣,他到欧洲考察。“在国外考察时期,他几乎到过欧洲所有的国家,其中也到过苏联,他在苏联参观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诸医学研究院的工作。”³在德国考察时,正值德国在研究细菌培植与投放的方法,这些引发了石井四郎的极大兴趣。回国后,他一边“在东京日军军医学院担任传染病学讲师”,一边利用教学实验室之

便,暗中进行了关于细菌武器的研究。

作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却研制起秘密细菌武器来,这是同石井四郎本人的毕生追求有关的。石井不仅具有浓厚的日本传统的武士道作风,而且非常崇拜德国历史上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心想当日本的“一代英豪”。在“731”部队里的军医们时常议论说:“老头子(指石井四郎,作者注)是个大将迷。”其实,要是日本军部没有军医最高的军衔只能是中将的规定的話,凭石井本人的努力和军部的急需,他当个大将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石井四郎崇拜俾斯麦,并不是崇拜俾斯麦的“铁”和“血”,而是崇拜他的抱负、意志和手段。因为日本缺乏支撑战争的五金矿藏,石井四郎所要采用的手段是比“铁”和“血”更要残忍的细菌武器。曾在伪满洲国任过陆军少将的韩蔚普见过石井四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曾在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会见过石井四郎。石井中等身材,语音很尖,态度稳重,显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他说:‘战争光靠兵力,对今天来讲已经过时了。科学上发明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害物质的有力武器,既简单,又便宜。不久即可在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这样的话。”这就是石井四郎终身追求的细菌武器。

三

细菌武器的研制最早年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史书上记载的只有化学武器和化学战。

化学战,最早记载是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之间。当时希腊半岛上的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正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雅典人固守在普来地及伯连母城,他们用石块砌筑了高大的城堡,斯巴达人靠长矛盾牌屡攻不克。情急之下,斯巴达人将木料蘸满了沥青和硫磺,堆在城壕之下,放火燃烧。沥青和硫磺在燃烧中产生一股刺鼻难闻的有毒气体。气体随风扑入城内,无孔不入。雅典人顿时觉得刺鼻难忍,只好弃城逃跑。斯巴达人乘机爬上城头,城乃

陷。^⑤

到了近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化学武器得到了更好的研制和更广泛的应用。1915年4月22日,德国在叶伯东北袭击英法联军时,德皇威廉二世便采纳了皇家教授哈伯的建议,将氯气制成液体装入钢管中密封起来。当风刮向英法联军阵地时,德军便炸开钢管。钢管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又将管内的氯气液体变成气体,密布于英法联军的阵地上空。正值加拿大军队首当其冲,因而大多数官兵呼吸了氯气,嗓内刺痛,肺管塞闭,顷刻之间,患者大多狂跳堕毙。此役,英法联军死伤达6千余人。后来,英法联军想出了防御办法,即将棉布沾上苏打水后又加入海波水做成口罩,始免除氯气的侵袭,不久,德国又研制出把毒气装在炮弹里的毒气炮弹。^⑥

1916年,德国又陆续研制出了呕吐气、催涕气、芥菜气等。尤其是芥菜气,其散布后,雾布地面,“天寒恒数十日不消散,制成毒雾困敌最佳。”如果吸吮了芥菜气,窒肺致命,触肤生泡。因而,它获得“群毒之王”之号。德军在攻击纽伯时,使用芥菜气2500吨,制造毒气弹5万发,使英法联军遭到巨大的杀伤。英法联军也对德军进行报复,在3年内用5万吨毒气,制造毒气炮弹1700万发。^⑦

1917年5月,美国也不甘落后,在华盛顿创办了毒气制造工厂,对外称:“化学军备处”。这座工厂占地面积达3400英亩,建营房66座,1917年拥有6000多工作人员,其中化学工程师1200名;翌年,拥有化学专家233人、技术工人3066人、兵士69048人。全厂分为五大部门,各有毒气生产项目和试验室。据1918年秋末的统计,该厂平均日产毒气200吨;若以每月生产某种毒气计算,分别为:氯气130万英磅,呕吐气100万英磅,福司根气130万英磅,芥菜气70万英磅。^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争相生产化学武器,相互残杀,死伤惨重。据美国统计,战争中美国官兵伤于毒气的人数达274217人,死于毒气的官兵达74779人。

细菌武器属生物武器。是比化学武器更先进的武器,是在化学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致于确切时间,还难以查考,但至少在1928年至1930年石井四郎到欧洲考察时,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已有时日了。

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主编费克汉·史梯特在《十九世纪》杂志七月号上就曾发表文章揭露德国在别国进行散布微菌的试验和预备微菌战一事。他说:“这些试验材料经由德国国防部(空中毒气攻击机关)发出,并且寄与各种制造化学工厂,接受的是一个航空制造厂。”他还说:“事实上在伦敦、巴黎确有德国某种数量的秘密人员从事这种(散布)工作。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地是,特别研究巴黎地下火车站入口与地面空气之关系,以及地洞内各处空气的流通情形,以为散布微菌时应该预先斟酌的参考资料。”同时他明确指出:“装微菌的东西,是玻璃质的圆筒,高2公尺,直径11公分4。”

同时期的法国斯德拉斯堡药物学院的微菌学教授萨多里和隐花植物学讲师萨多理合著的《无敌战争》一文也证实了这件事。他们证实道:“这位新闻家确实有证据在手,证明自从白鲁宁内阁时代起,德国即在许多国家举行过大量的关于微菌战的试验,并且有了很大的成功。”他们还举出两件实际例子:一次在刚果尔德广场(在共和国广场也做过相同的试验),试验结果,在证明板上找出4231个微菌体;再一次在巴士特车站附近,试验结果也非常好,在证明板上找到95778个微菌体。他们还了解到德国做的一些散布微菌方法的情况,他们说:“德国已掌握如何以飞机为媒介,把有毒微菌用人造雨方法,散布于所要散布的地带上,并注意到怎样调整毒菌的下降,以及毒菌落地时所应达到的各点。”(《微菌学》,又名《无敌战争》)

对于史梯特和两位萨多里的揭露,德国政府并未作出任何否认的表示。而实际上,当时德国不仅在各国进行过散布细菌的试验,而且其研究细菌武器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诸如:如何保存、增强微菌的毒性,如何传播微菌以及如何用

飞机散布细菌等等,都有较大的成果。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细菌武器的研究毕竟是初创时期,而且还只限于实验室中,尚不敢公开试验,因而仍有许多难题并没有解决好,诸如:使用细菌武器的攻击是否可能?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是否确能造成威胁?这类威胁又有多大?用细菌武器对己方是否也会有伤害?受到伤害时怎么办?在许多细菌中哪种细菌最有杀伤力?怎么散布细菌?细菌在空中能保持多久?空气中的气流等因素对细菌有何影响?怎么清理细菌战后的战场?等等。^④

四

尽管德国在细菌武器研究中还有许多疑问,尽管细菌武器对石井四郎来说还是个谜,但在石井四郎看来,它毕竟比化学武器要先进,比炮弹更先进,特别是对于缺乏五金矿藏的日本来说,它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新型武器。因而,石井四郎在细菌武器的研究方面投入了全部身心。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代帮了石井四郎的大忙,他不负军部之重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细菌战理论已经有了初步轮廓。当时,已是1933年的春夏之交。

至此,石井四郎对小小的学院实验室已不再满意。对以小白鼠为试验对象更不满意,他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实验场所和更好的实验对象。于是他设想出一种极其残忍的想法——到满洲去。为此,他当即写了一份报告,直接递给当时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要求西汉把报告转呈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石井四郎的报告不长,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军部不断地指导和鼓励,使得以石井军医少佐为首的陆军细菌战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细菌武器的研究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干部调往满洲工作,使我们用来卫护皇国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草原:日寇细菌战暴行》第3页)

石井四郎的报告很快便得到日本军部召开的秘密会议的通过,并得到天皇裕仁的批准。1933年春末夏初,该研究班到满洲后,改称实验所,“仍由石井四郎领导,对外则以石井本人的姓氏命名为“石井部队”。为了加强对石井部队的领导,军部指令陆军省将细菌研究班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第731部队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这是在该部队成立时就由日本陆相明令规定的。”(山田乙三供词)

日本军部和石井四郎之所以要将细菌研究班调到满洲去,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东北三省特别是中苏、中蒙边境,历史上就是自然鼠疫污染区,在这样的地方搞细菌研究与试验,既可轻易地弄到细菌源,又利于繁殖细菌,还可以掩人耳目。混淆是非、贼喊捉贼。

据载,14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即源于中国东北。191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10卷10期上有篇题为《北方鼠疫传入欧洲》的文章是这样追记这件事的:14世纪,自中国北方鼠疫传于西欧,死亡达数百万人。患病者,眼红似盲,忽倒若醉人,翻蹠移时,起立如醒。再次倒地,如作鼾声,皮肤焦热。向之谵语,喉间格格响,不能答。少顷,病加剧,寒热大作。脉息跳动极速,呼吸急促。其后,转咳嗽,继而痰中带血,一日乃死。死前后,皮肤红色,渐变为黄,至死成铅之黑色,故谓:“黑死病”。此病日本医家称:“百斯焉”,即鼠疫。我们且不追究欧洲这场大鼠疫是否到底源于中国东北,但14世纪中国东北曾发生过鼠疫传染病,以及东北有鼠疫传染史则是事实。

1910年冬天,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突然发生了不应在冬季发生的鼠疫传染病,死亡近6000人,占当时该地总人口的3分之1。此场鼠疫来势凶猛,由哈尔滨逐渐传染到长春、沈阳、锦州、辽阳等地,甚至传到山东、河北一带。此疫传染3个月,仅东北地区死亡9万多人。当时,清政府组织了由11国34名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防疫研究会”来调查和扑灭此次鼠疫。后来,由于“日俄二国乘机欲吞地大人众之满

洲。俄国籍口瘟疫之传欧洲为辞,主张出兵相助。日本政府亦极力诋斥清政府防疫不力,欲思强行干涉……”(《东方杂志》:《追记满洲防疫事》1914年第10期)因此,清政府下令解散“万国防疫研究会”,改由中国医师伍连德主持,其成员由中国医师组成。因为当时缺少有效药材,故其扑救方法十分简单,采用隔离和焚烧的办法。当时向中东铁路借用了一百辆闷罐货车权作隔离所;对贫民窟中的低矮简陋的草房、木板房等约610多间则全部烧毁。就这样,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才扑灭了这场鼠疫。

事后,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中国医师金绍卿,就此次“鼠疫”作了题为:《万国防疫会纪事》一文,就东北为什么会流行鼠疫一事作了深入实际的调查报告:“满洲里对面相距十里有一小镇。在那里的山间、河沼地,生活有一种山鼠,它的皮价昂贵,制成裘皮衣服,颇受国际市场欢迎。世称山鼠为旱獭。这类山鼠,其形如兔,体常肿胀,身长8寸余,前脚短于后腿,跑时跳跃极速,介于鼠兔之间。山鼠体上,寄生跳蚤,含有鼠疫菌。经常穴居,善冬眠。捕捉时,卧穴者,多患鼠疫病;野地里的山鼠,多无病,难捕捉。故至该地捕旱獭者,年年都有千百人被染上鼠疫死亡。”(刊《东方杂志》1911年第二期)

在另一部上下二册的《东三省疫情报告》中,对这场鼠疫产生的原因作为更为详细的叙述:1910年10月,大批由山东去满洲里捕旱獭的人,齐集在满洲里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幸,这些人在捕旱獭时感染了鼠疫菌,当即死亡了3、4千人。有些染有鼠疫菌的患者,想乘火车回家治病。结果,他们在列车上沿路下车、沿路死亡,把鼠疫菌带到了沿铁路线的各城市。其中,有马良、张志善二人染有鼠疫菌,他们在哈尔滨下车后,住进傅家甸第一区同发街232号小店。不幸,当晚皆死于鼠疫。店主及店客对他们染有鼠疫一事毫无察觉,便将他2人埋葬。不料,由此不到20天,不仅小店店主等20余人皆染病身亡,而且将鼠疫菌从同发街沿新民街传染了全区。位于南大6道街的一座丹麦教堂,400多人不到10天即全部死于鼠疫。其惨状真如清乾

登时死于鼠疫的诗人师道南的遗作《鼠疫行》所述：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折堵。
怪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
三人行末十几步，忽死二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灭，人鬼尸棺暗同屋。
鸟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
人日逢人多疑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

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做回春雨。”¹¹

此后，东北鼠疫连年不断。1920年冬，傅家甸再次发生鼠疫，全东北死亡6万人；1928年，通辽发生了鼠疫；1929年，通辽、扶余发现鼠疫患者400余人；1930年，开原及其西部郑家屯、安广等地均发生鼠疫；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以后，鼠疫仍然不断。¹²

日本军部和石井四郎正是看中了东北有严重鼠疫传染的历史。因为在这样的地方进行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研究、试验、生产很容易，且不被人发现。

其次，“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¹³细菌武器要获成功，不仅需要实验室里的技术性研究，而且还需要广泛地进行各种试验。石井四郎在申请去满洲之前，所解决的多是实验室里的技术性问题；而且，当时虽然也用实物进行过实验，但实验对象多是日本产的小白鼠。而石井四郎十分清楚，小白鼠毕竟不同于人，要研究成功对人类进行战争的细菌武器，用活人做实验“材料”，要比用动物做实验，会取得更好的更准确的数据。恰恰当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战场上日军不仅能大量俘虏中国军人和百姓，而且还可俘虏到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对这些活人进行细菌试验，不仅有利于细菌武器的研制，

且客观上也替日军多消灭一些“敌人”

第三，日本军部和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苏联等国家进行细菌战争，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因而，将细菌研究班移到满洲，不仅利于对中国军队直接施用细菌武器，而且还利于将来实行对苏联的细菌战。

我们知道，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里，中国首当其冲，能否征服中国是其能否征服世界的重要先决条件。然而，几年来的中国人民抗战，使日本军国主义体会到，要彻底征服中国确非易事，仅依凭一些常规武器是根本达不到目的，因而他们企图采用一些残忍的消灭中国人民的手段，即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大面积的细菌战。●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内不仅仅有朝鲜和中国，而且也有苏俄。日本对苏俄的侵略野心可以追溯到明治初期。1871年12月24日，在由山县有朋、川村纯义、西乡从道提出的“国防方针”中，就“提出军事当局以俄为假想敌国，从而使军备优先于其他政事的意见。”这种意见“成为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陆军的大陆国防施策的基础。”的确如此，在明治39年（1906年）制订的：关于国防大方针的意见”中，就确定日本以后的发展地区为：“第一，西伯利亚、满洲及蒙古方面。第二，菲律宾及法属印度支那以南、南洋群岛。第三，中、南美洲。”同时在方针中指出：“妨害我达到目的之最危险之敌国”即是俄国。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就又面临与苏联的防战关系问题，为此参谋本部重新制定了新的对苏作战计划，计划详细分析了日、苏双方的情况，并作了详细而周到的进攻苏联的策略。1933年6月，在日本省部第一次会议中一致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2页、88页、239页）

由此可见，在日本的发展地区中包括苏联领土。日本扩展“利益线”时认为苏联是其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日本对苏战争是必然的，这样细菌武器用于对苏战争也是必然的。故而，将细菌

“研究班迁到满洲，以“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武器根据地。”^①对此，前关东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受审时供称道：“第731部队是一个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大联合制造厂，它之所以建立在满洲境内，是由于战略上的打算，因为当时日本准备对苏联进行战争，而这支部队的全部活动，也就是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松村知胜供词）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诸如，满洲介于

中国内地及苏联之间，其气候则兼具两地的特点，因而在这种气候环境下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更具有针对性。细菌武器研制所需经费，属于非常军事预算。将细菌研究班迁入满洲，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后，其一切费用皆可列在关东军非常军事预算内，这笔预算不必向国会报销，因而就能使国会内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存在与活动，更能使日本人民不知晓这件事。等等。

【注 释】

①——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09页）

②——见《关东宪兵队和各地宪兵队的历史及各地宪兵队名单》

③④同注释①第110页。

⑤⑥⑦⑧——见《新东北建设》第一卷第二章《古代化学战》1928年—1931年合订本。

⑨——《东方杂志》35卷3号。总题《细菌战》，副题：《明日的斗争》

⑩——关于这个确切时间，现在有多种说法。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6页中说是在1933年某月某日迁入满洲的，说出了年代，而未公开具体月份和日期；据《前日本陆军军人案审判材料》第10页讲：“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中认为是1933年8月迁入满洲的。具体时间可以《日寇细菌战暴行》定为1933年夏初。另外，当时日本军部启用石井四郎为1932年8月，不到一年写出报告去满洲，从时间上推算也应在春末夏初。

⑪⑫1948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编印的《鼠疫学》。⑬——同注释①第123页。

⑭——同注释①第122页